

就像干旱的土地渴求雨水

郭文斌

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志愿者要弘扬传统文化?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,现在老百姓最大的需求不是钱,不是房子,不是车子,不是物质,而是心灵饥渴。这种需求就像一块干旱了一百年的土地对雨水的渴求。所以,我们就要尽力推广优秀传统文化,推广《弟子规》,引导大家学用《弟子规》。

“冬则温,夏则清”讲的是人的感受力。到夏天了,该换衣服了,要把棉袄换下来了。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发现,相当多的人没有这个感受力。别人明明想吃苹果,他却把香蕉给人家。因为感受力不够,造成的家庭纠纷太多了。夫妻之所以常常吵架,甚至发生家庭暴力,往往是因为感受力不够。有一种暴力是强暴力,有一种暴力是软暴力。比如丈夫明明这一刻不需要那一份营养,妻子却以健康为由,强迫先生,往他嘴里塞水果。虽然妻子是好心,但对于先生来说这就是被暴力,一种温柔的暴力。有些妻子感觉到丈夫也是这样。所以,一个人如果感受力不够,这个人很可能就会表现出这么几个状态——占有欲、控制欲、表现欲。特别是控制欲,总想把对方牢牢地抓在手上。人家需要短袖的时候,你把棉袄给人家了;人家需要棉袄的时候,你把短袖给人家了。

在传统文化学习过程中,也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有一次到石家庄讲课,互动环节,有一位老先生说,郭老师这么好的课,可是他们家才来了一半,他真想把没来的那几位拿绳子捆过来。这就是暴力思维。虽然是好心,但是有强迫性。所以,我们推行传统文化一定要随缘。孩子这一刻兴致还没到这个地方,就不能着急,要有耐心,要学会等待。等到他饿了,渴了,需要了,自然就来了。人家现在还不需要呢,就让他去撞。等到他跌跌撞撞,走不通了,来找你时,你再把路指给他,他自然会接受。

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父母,教育孩子带有强迫性。孩子在那里玩泥巴,正在兴头上,妈妈一把逮住,“回去背唐诗去,读《格林童话》去”。她哪里知道,孩子玩泥巴是更重要的生命需要,那是一种自然亲近性训练,同时也是身心投入性训练、专注力训练、协调性训练、现场感训练。现在的孩子为什么好动?往往就是因为父母躁。父母的躁投射到孩子身上,一会儿给他这个安排,一会给他这个指导。有许多父母,从早到晚都在教育孩子,可是孩子却非常逆反。为什么呢?他的心是躁的。孩子是父母的投射,底片是躁的,屏幕上能安静吗?所以,在日常生活中,过日子也好,工作也好,要想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人,就不要去强迫他人。

我们讲《弟子规》是维护人类永久性生存、维护人类群体性生活、维护个体幸福的“规”。那怎么样来实现它的永久性、群体性和幸福性呢?首先要有感受力。“金屑虽贵,落眼成翳”,黄金虽然很贵,但是放在眼睛里就是祸害。传统文化虽好,但是你在不恰当的时候灌输给人家,给人的感觉就是强迫。

这些年有些人弘扬传统文化也出现了问题,拿着一本《弟子规》见人就送。心是好的,但效果很不好。那应该怎么做呢?先让自己快乐。大家一看,这个人原来天天抱怨,天天愁眉苦脸,最近怎么这么快乐呢?他就会对你产生兴趣,然后问你最近学什么了?你说我最近听郭文斌的课了。他问郭文斌讲什么啊,你说讲《弟子规》。他就来听课。一听,觉得有道理,不用说,他就开始学和用了。所以,推行传统文化,最好的广告,最好的招牌在你脸上,你先快乐,先把脸换掉,把愁眉苦脸换成一个欢天喜地的脸,就是最好的广告。《弟子规》应该变成你脸上的微笑,而不是那一本书。

我的窗外有一株梅花。今天,久违的阳光照进办公室,我往窗外一探,发现那株梅花满树花苞,有一二朵竟向阳怒放。红而不艳,暖意盈盈。

都说是腊梅开放的时节,怎么红梅迫不及待来报春了?戊戌岁杪,阴历的日子过久了,给点阳光人真的就能灿烂。心里面不由得赞一声,到底是梅花啊,难怪自古以来,那么多文人墨客为它吟诗作画。

在我的老家嘉善魏塘镇,就有这么一位“梅痴”——吴镇。位居“元四家”之首的吴镇,在自家庭院种满了梅花,取名梅花庵,自号“梅花道人”,晚号“梅沙弥”,不仅如此,临终前还给自己找好了墓地,题写了墓碑“梅花和尚之塔”。据说隶书“梅花和尚之塔”的碑文至今在嘉善博物馆完好保存。

吴镇有诗书画三绝,想象中,他的作品应该不乏梅花才是,然而至今并不曾发现有其梅花作品,倒是他画的墨竹,尚存墨迹,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他的《竹谱图卷》。

二十多年前,我第一次到梅花庵,印象最深的正是吴镇的《八竹碑》碑刻,那是吴镇晚年绘的八幅墨竹。

有人说,吴镇从来不画梅。我不昧揣测,应该不是吴镇不画梅,而是他的“梅作”都随

那一天早晨,蓬勃的阳光璀璨璨的,把大地照得像水晶般明亮。我来到了那个每一寸空气都窜满了鱼腥的渔村。

坐落于塞内加尔西北部的恩达尔,是西非最古老的渔村,拥有300余年的历史。渔村距离塞内加尔河很近,渔产惊人地丰富。

通谙英语的瓦蓝丁若亦庄亦谐地对我说道:“有一回,我到塞内加尔河畔散步,赫然看到原本蔚蓝色的河水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,走近一瞅,哎哟,河里挤挤迫迫的,全都是大大小小的鱼儿啊!渔夫根本不必撒网,伸手一捞,便能捞个盆满钵溢。”

这天早晨,辽阔的圣路易斯河上,满满地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渔船;船上,堆满了刚刚捕获回来肥肥瘦瘦的鱼。渔船超大者可以容纳15人、中型者可坐七人,最小者仅容二人。渔夫们就在船上将鱼分类,体积肥硕的鱼放进大桶里、瘦小的搁入大盆内。

让我目瞪口呆而又莫名其妙的是,渔夫们居然将盆里的小鱼一股脑儿地倒在沙滩上。这些被丢弃的鱼,引来了不计其数的苍蝇和飞鸟,也引来了许多捡拾鱼儿的妇孺。被丢弃的鱼实在太多了,所以,她们只捡拾那些较为肥大的。有些畜牧人家也来捡拾,据说他们把鱼捡拾回家后,烧成粉末,掺进饲料里,喂牛、喂羊,刺激乳腺,使它们能分泌更多的奶汁。足堪忧虑的是,牛和羊都是素食者,如此

我的第一个出版社邻居是宋原放伯伯。他个子壮实,声音低沉。他与爱人海阿姨都说普通话,不讲上海闲话。

他家客厅兼书房和他的卧室。靠东窗放写字台,台灯半圆形墨绿灯罩。西墙是排大书橱,东西阳台门间有一小竹书架,最上一格放《人民日报》,记得书架上方挂着焦裕禄的照片。宋伯伯爱围棋,常见沙发旁的茶几上,有本打开的棋谱。父亲从部队回沪探亲,也被约去下几盘。

“文革”开始,他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造反派,来抄这社长兼总编的家。上一年级的我,虽识字不多,但认出丢地板上几本厚精装书的名:《资本论》。宋家被扫地出门,搬出了茂名南路。

再见宋伯伯是二十年后的1986年,我做“上海青年最喜爱的十本书”活动,请时任市版协主席的他颁奖。那时,他住复兴中路,上门没碰到,却准时来到文艺会堂。来回都不要车接,热情支持年轻人的读书。那天,我把他的名字写得有点草,“原”似“厚”。被介绍人读成“宋厚放”,坐他身旁的宋伯伯笑了,低声纠正:宋原放。

搬了几回家,出版社邻居多了起来:有文艺、辞书、科技,还有教育和大百科等。母亲认识得多,楼上有时任出版局副局长袁是德母亲,楼下有何满子先生女儿……就说同层的左泥和周天叔叔,他们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。

左叔叔爱人王老师,几乎天天来与母亲聊天。她原在静安区机关幼儿园,我在那待了五年;她没教过我,与我的老师钱蓉枝是好朋友。王老师教母亲做幼儿园的招牌菜:肉糜虎皮蛋。煮熟蛋,一切二,截面抹肉糜,油炸再红烧。想来,左叔叔吃的菜是童趣满满。

我还在读大学的1979年,左叔叔编了本不

纵有遗迹在,当年的八万卷藏书已无处可寻。

身处梅乡,朱彝尊诗词里倒是不乏写梅之作。比如这首《云中至日》:城晚角声通雁塞,关寒马色上龙堆。故园望断江村里,愁说梅花细雪开。

这位“愁说梅花”的词人,是个情痴,一生所作诗词无数,有不少竟是为妻妹冯寿常而作。他以冯寿常的字“静志”作为自己诗话和词集之名《静志居诗话》和《静志居琴趣》,其中后者写尽两人的爱恋和思念。《曝书亭集》中有一首两千字长诗《风怀二百韵》,曾有人劝他删除,他思虑再三后作出决定:“宁不食两虎特豚,不删《风怀二百韵》。”意思宁可不入祀孔庙,也不删此诗。

我窗外那株梅花不远处,还有一株梅花,以及一片修竹。这几年,每年三月,我都会在那里稍作逗留。那里,曾有一尊朱彝尊的雕像,也曾留下我与一位故人的影像。

不知何时,竹坨的雕像不见了。而梅花,依然开了落,落了开。

窗外有株梅

子扬

此,对这位老家的乡贤多了分亲近,对喜欢梅竹之士多了分好感,比如另一位乡贤朱彝尊。

朱彝尊,这位比吴镇晚出生三个半世纪的“浙西词派”创始人、藏书家,同样居住在一个种满梅花的地方,梅里,“性癖好竹”,建竹垞故号竹垞。只是后来,因为他写了皇皇八十卷的《曝书亭集》,他的藏书楼“曝书亭”名声越来越响,以致“嘉兴十二景”有一景就叫“曝书竹影”。前不久,藏书家韦力来嘉兴,我问他嘉兴哪个藏书楼给他印象最深,他便首推曝书亭,因为“既重要又有遗迹在”。然

暗藏商机的渔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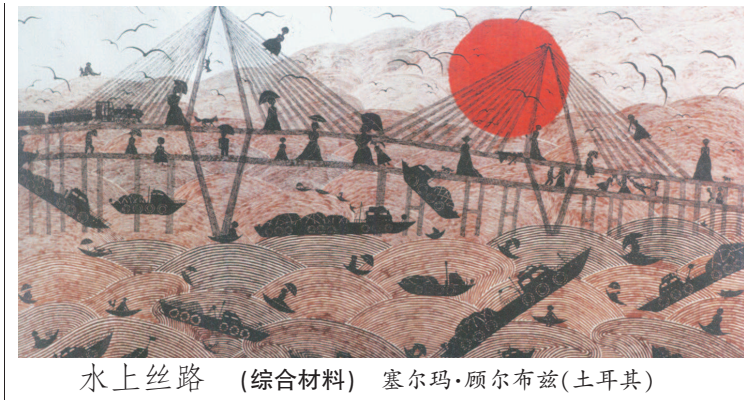
(新加坡)尤今

硬生生地把鲜鱼磨成粉喂养它们,假以时日,会不会引发另一轮的疯牛症、抑或是疯羊症呢?

向瓦蓝丁若探询鲜鱼被弃置沙滩的原因,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说:“他们捕获的鱼太多了,小鱼根本卖不出去。塞内加尔生活水平低落,没有冷藏的储存库,丢弃是唯一解决方法。”说着,他指了指一些肩上驮着重物的孩子说道:“瞧,他们卖的,就是供鱼儿保鲜的冰块了。问题是:附近就只有那么区区一家制冰厂,根本就供不应求啊!”

“这样滥捕滥丢,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!”我说。

“对对对,总有一天,塞内加尔河甚至于大西洋里的鱼类,都会被赶尽杀绝的!实际上,渔夫们应该设计网眼较小的渔网,让小鱼存活,等它们大了才去捕获,这样才能确保鱼儿生生不息,也才能确保下一代有足够的鱼可供果腹啊!”瓦蓝丁若语重心长地说道:“实际上,塞内加尔的渔业具有强大的潜力,比方说,过剩的鱼类可以制成咸鱼、鱼干和鱼罐头等等,输送出口,这样一来,不但可以改善渔



水上丝路 (综合材料) 塞尔玛·顾尔布兹(土耳其)

同凡响的书,选编发表上世纪50年代具有影响却受公开批判的作品。有独立思考的,才会独具慧眼。共选了17位作者的20篇作品,其中有作者当时还未平反,带有风险。但年前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已亮出了“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”大旗。

书名叫什么?文学读物编辑室在《迟开的鲜花》上徘徊,一锤定音是室负责人吴真伯伯。他提议,定名《重放的鲜花》。31万字的书,第1版印10万册。《出版前言》里写道,“重读这些二十多年前的作品,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。”我读到了百闻终得一见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(王蒙)、《小巷深处》(陆文夫)、《在悬崖上》(邓友梅)等小说,嗅到了鲜花的芬芳。

《上海出版志》评价道,“《重放的鲜花》的出版,使这些作者看到了光明,也促进了他们在文坛上重新崛起。这本书的出版,不仅说明了编辑在政治上的胆识,更说明了编辑同这些受压作家之间的感情。”

左叔叔瘦高个,而周天叔叔显得敦实。对周叔叔早闻大名,上中学时,就读过他小有名气的反映市郊农村的长篇小说。巧的是,他儿子与母亲好友玲玲阿姨的女儿结秦晋之好。

周叔叔后来的名气源自蜜蜂。他编剧的《蜜蜂王国》,上海科影厂1981年拍成片。“该片揭示了蜜蜂家族的生活规律、奥秘、特色及其对自然界和人类的作用”,获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及1982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。之后,他又写了《蜜蜂王国见闻》。

民的生活,而且,也可以使塞内加尔渔业的美誉传扬在外。可惜政府没有好好地加以扶植,商家也没有觑准商机加以发展。”

塞内加尔的渔村,的确蕴藏了无限的商机,等着独具慧眼的人去发掘。

有些妇人,每天早上等在岸边,等渔夫的渔船一靠岸,便拿着大桶或竹篓去买鱼,一大桶几十尾,才售2000西非法郎(折合人民币大约25元),真是“价贱如土”啊!鲜鱼的价格,每天都不同,视捕鱼量多少而定。妇人把鱼送到菜市场去零售,价格立马翻了三四倍,每桶可以卖6000至8000西非法郎。妇女的桶盛得太满了,她们吃力地提着走时,一些鱼儿便趁机“投奔自由”,有些孩童,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捡拾,妇人也不干涉,任由他去。孩童拾了一尾又一尾,渐渐地,小小的竹篮盛满了,便拿到路边去叫卖。

刚才那些在沙滩上捡拾鲜鱼的妇女,此刻都坐在树荫下休息,闲话家常,每个人身旁的篮子,都放满了“不劳而获”的鱼。看到我走过,居然伸手讨钱。我调侃地说:“嘿嘿,你们天天餐餐有鱼吃,日子过得比我还滋润呢!”她们齐声叹气:“唉呀,我们的日子,穷得只剩下鱼了。”

我哈哈大笑,然而,想深一层,年年、月月、天天、餐餐都吃鱼,就算是龙肝凤胆,也会吃腻的呀!

上世纪90年代,他转向帝王写作,著作颇丰。主编《中国历代帝王故事》、《皇帝读书考》和《中国历代廉政监察制度史》等。他的博客也聚焦历史,《半月传》热播时,写下《半月性格得失谈》、《宣太后与黄歇的辩论,谁对?谁错?》、《<半月传>背景谈:半月与宣太后的相互妥协与缝合,完成了一个刘备式的政治人物形象类型》等。

他对现实同样关注,论《毒保姆与性恶论》,谈房价:“房价又上涨了。记忆中,这些年来,上涨基本上没有停过。当然,我早已在三十余年前,由单位分了房子,大致过得去。房子大小也可以了,只是朝东又略偏北,冬天较少或没有太阳;一直想改善一下,这样的房价,肯定是没有机会了。”

前些日子,听说周叔叔不在家待着,而是与养蜂人在一起。我想,他是不会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的;无论生活如何变幻,睿智和勤奋使他走出自己更长远的路。

静安居诗词

高昌

致雅集诗友
莞尔海棠笑,
新诗应节生。
嫩红宜入画,
鲜绿每添情。
送温暖
送暖入屠苏,
春风淡似无。
高天仰光月,
惜与草民疏。

春歌
沿河诗料梳金柳,
遍地春风滚碧波。
陇亩先栽心一粒,
秋来请献粟千钟。
题水晶作品《竞自由》
一路波波争上游,
风涛万里竞潮头。
劝君休起龙门美,
只在江湖是自由。

